

汪曾祺

散文全编

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汪曾祺

散文全编

陆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汪曾祺散文全编

(第六卷)

1994 年

在台北闻急救车鸣笛声有感^①

我喜欢一个人坐坐。参加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,由于疲劳和其他原因,昨天晚上流了鼻血,今天对向往已久的阳明山竟未能随行览胜,坐在宾馆里喝茶休息。忽然听到马路上连续起伏的尖厉的鸣笛声音。这给我很大刺激。但是我的情绪很快就好转了,我断定:这是急救车的鸣笛。

这种尖厉的、起伏不停的鸣笛声,据我所知,有三类,一是急救车,一是救火车,一是抓人的警车。

我在“文革”期间,随时可听到警车的鸣笛声,听得人心惊肉跳,毛骨悚然。这种杀气腾腾的声音,不但人听熟了,连鸟都听熟了。

北京的画眉很多会模仿这样尖厉的声音,画眉讲究有“口”,有的画眉能模仿好多种声音,如山喜鹊、大喜鹊、苇咋子、猫叫、麻雀争风,甚至推运水的木轮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。但是不能瞎叫。瞎叫谓之“脏口”。凡画眉学了“脏口”,养鸟的就会抓出来立刻摔死。学警车,就是“脏口”,养画眉的听到这种“脏口”,会毫不犹豫地从小笼里把它抓出来,只叭嚓一声摔在地下。

画眉何辜?这只是表现了养鸟人对这种声音的厌恶。

世界上许多事物,外表相似,而内涵不同。急救车、救火车、抓人的警车,鸣笛声极相似,但是在对人的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差异。

差异何在?在对人的态度。简单地说,是合乎不合乎人道主义。急救车、救火车,表现了对人的关切;而警车,不管怎么说,都表现了对人的压制。

这种对鸣笛声的感情,我想台湾、大陆是一致的。台湾、大陆的民众的心理是相通的。

全世界的普通人的心理是相通的。

因此,世界是有希望的。

注 释

- ① 本篇原载 1994 年 1 月 12 日台湾《中国时报》。

七载云烟^①

天地一瞬

我在云南住过七年，1939—1946年。准确地说，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。昆明以外，最远只到过呈贡，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，柳树浓密的叫做斗南村的地方，连富民都没有去过。后期在黄土坡、白马庙各住过年把二年，这只能算是郊区。到过金殿、黑龙潭、大观楼，都只是去游逛，当日来回。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。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。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，南至金马碧鸡牌坊，当时是昆明的贯通南北的干线，又是市中心所在。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，——演的都是美国片子。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，闲看。

我们去逛书店。当时书店都是开架售书，可以自己抽出书来看。有的穷大学生会靠在柜台一边，看一本书，一看两三个小时。

逛裱画店。昆明几乎家家都有钱南园的写得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。还有一个吴忠荃老先生写的极其流利但用笔扁如竹篾的行书四扇屏。慰情聊胜无，看看也是享受。

武成路后街有两家做锡箔的作坊。我每次经过，都要停下来看做锡箔的师傅在一个木墩上垫了很厚的粗草纸，草纸间衬了锡片，用一柄很大的木槌，使劲夯砸那一垛草纸。师傅浑身是汗，于是锡箔就槌成了。没有人愿意陪我欣赏这种槌锡箔艺术，他们都以为：“这有什么看头！”

逛茶叶店。茶叶店有什么逛头？有！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，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。字写得好，联语尤好：

静对古碑临黑女
闲吟绝句比红儿

我觉得这对得很巧,但至今不知道这是谁的句子。尤其使我不明白的,是这家茶叶店为什么要挂这样一副对子?

我们每天经过,随时往来的地方,还是大西门一带。大西门里的文林街,大西门外的凤翥街、龙翔街。“凤翥”、“龙翔”,不知道是哪位擅于辞藻的文人起下的富丽堂皇的街名,其实这只是两条丁字形的小小的横竖街。街虽小,人却多,气味浓稠。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头卸货、装货、喝酒、吃饭、抽鸦片、睡女人的地方。我们在街上很难“深入”这种生活的里层,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:这是生活!我们在街上闲看。看卖木柴的,卖木炭的,卖粗瓷碗、卖砂锅的,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。

但是我生活得最久,接受影响最深,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个作家,——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,是西南联大,新校舍。

骑了毛驴考大学

万里长征,
辞却了五朝宫阙。
暂驻足,
衡山湘水,
又成离别。
绝徼移栽桢干质,
九州遍洒黎元血。
尽笳吹弦诵在山城,
情弥切……

——西南联大校歌

日寇侵华,平津沦陷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被迫南迁,组成一个大学,在

长沙暂住,名为“临时大学”。后迁云南,改名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,简称“西南联大”。这是一座战时的,临时性的大学,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,影响深远,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,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,窳陋而辉煌的,奇迹一样的,“空前绝后”的大学。喔,我的母校,我的西南联大!

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,大概有几条路径。

一条是陆路。三校部分同学组成“西南旅行团”,由长沙出发,走向大西南。一路夜宿晓行,埋锅造饭,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。他们的“著装”是短衣,打绑腿,布条编的草鞋,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,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,有点像后来的大串联的红卫兵。除了摆渡过河外,全是徒步。自长沙至昆明,全程3500里,算得是一个壮举。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,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闻先生一路画了不少铅笔速写。其时闻先生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,——闻先生曾发愿:抗战不胜,誓不剃须!

另一路是海程。由天津或上海搭乘怡和或太古轮船,经香港,到越南海防,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,由老街入境,至昆明。

有意思的是,轮船上开饭,除了白米饭之外,还有一箩高粱米饭。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。吃高粱米饭,就咸鱼、小虾,可以使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,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。

我们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,易得恶性疟疾,沿路的水不能喝,于是带了好多瓶矿泉水。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,很贵。

没有想到恶性疟疾照顾上了我!到了昆明,就发了病,高烧超过四十度,进了医院,医生就给我打了强心针(我还跟护士开玩笑,问“要不要写遗书?”)。用的药是606,我赶快声明:我没有生梅毒!

出了院,晕晕惚惚地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。上帝保佑,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,我当时真是像做梦一样。

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,取道各有不同。

有一位历史系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,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。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,说话乡音极重,而且四年

不改。

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,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,一路骑到昆明来的。此人精瘦,外号“黑鬼”,宁波人。

这样一些莘莘学子,不远千里,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,考入西南联大,他们来干什么,寻找什么?

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,寻找智慧的。

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,糊里糊涂的。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,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,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,学生上课、考试,都很随便,可以吊儿郎当。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。

我寻找什么?

寻找潇洒。

斯 是 陋 室

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,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、学校、祠堂。自建的,集中,成片的校舍叫“新校舍”。

新校舍大门南向,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。这条路是土路,下雨天滑不留足,摔倒的人很多。这条土路把新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。

西边是学生宿舍。土墙,草顶。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,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,便是窗户。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,一边十张,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,桌椅是没有的。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擦起来,既是书桌,也是衣柜。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,很便宜,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“财产”。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,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。有的不是这个大学的,却住在这里。有一位,姓曹,是同济大学的,学的是机械工程,可是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,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。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,乐数晨夕,堪称知己。也有老死不相往来,几乎等于不认识的。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,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,他住上铺,我住下铺,却很少见面。他是个很守规矩,很用功的人,每天按时作息。

我是个夜猫子，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，到天亮才回宿舍。等我回屋就寝时，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。

大路的东侧，是大图书馆。这是新校舍唯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。每天一早，就有人等在门外“抢图书馆”，——抢位置，抢指定参考书。大图书馆藏书不少，但指定参考书总是不够用的。

每月月初要在这里开一次“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”，简称“国民月会”。把图书馆大门关上，钉了两面交叉的党国旗，便是会场。所谓月会，就是由学校的负责人讲一通话。讲的次数最多的是梅贻琦，他当时是主持日常校务的校长（北大校长蒋梦麟、南开校长张伯苓）。梅先生相貌清癯，人很严肃，但讲话有时很幽默。有一个时期昆明闹霍乱，梅先生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，说：“有同学说：‘我在外面乱吃了好多次，也没有得一次霍乱’，同学们！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。”

更东，是教室区。土墙，铁皮屋顶（涂了绿漆）。下起雨来，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，让人想起王禹偁的《黄冈竹楼记》。

这些教室方向不同，大小不一，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，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，都是本色，不漆油漆。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，我在爱荷华、耶鲁都看见过。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，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。吴宓（雨僧）先生讲《红楼梦》，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，就放下手杖，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。于是一些男同学也就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。到宝姐姐、林妹妹都坐下了，吴先生才开始讲。

这样的陋室之中，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。

联大五十周年校庆时，校友从各地纷纷返校。一位从国外赶回来的老同学（是个男生），进了大门就跪在地下放声大哭。

前几年我重回昆明，到新校舍旧址（现在是云南师范大学）看了看，全都变了样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东北角还保存了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，也岌岌可危了。

不衫不履

联大师生服装各异,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。

女生的衣著是比较整洁的。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,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。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 Party 时才穿,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。一般女生都是一身阴丹士林旗袍,上身套一件红毛衣。低年级的女生爱穿“工裤”,——劳动布的长裤,上面有两条很宽的带子,白色或浅花的衬衫。这大概本是北京的女中学生流行的服装,这种风气被贝满等校的女生带到昆明来了。

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,裤线笔直的,也有穿麂皮夹克的,后来就日渐少了,绝大多数是蓝布衫,长裤。几年下来,衣服破旧,就想各种办法“弥补”,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。有人裤子破了洞,不会补,也无针线,就找一根麻筋,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。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。

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。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,式样早就过时,领子很高,袖子很窄。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,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氍毹的一口钟(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)披在身上,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。有一个女生从南院(女生宿舍)到新校舍去,天已经黑了,路上没有人,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,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,很紧张,回头一看,是化学教授曾昭抡。他穿了一双空前(露着脚趾)绝后鞋(后跟烂了,提不起来,只能半跛着),因此发出梯里突鲁的声音。

联大师生破衣烂衫,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,真是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,这种精神,人天可感。

当时“下海”的,也有。有的学生跑仰光、腊戍,趸卖“玻璃丝袜”、“旁氏口红”;有一个华侨同学在南屏街开了一家很大的咖啡馆,那是极少数。

采 薇

大学生大都爱吃,食欲很旺,有两个钱都吃掉了。

初到昆明,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,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,不时可以得到接济,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。汽锅鸡、过桥米线、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、东月楼的锅贴乌鱼、映时春的油淋鸡、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、厚德福的铁锅蛋、松鹤楼的乳腐肉、“三六九”(一家上海面馆)的大排骨面,全都吃了一个遍。

钱逐渐用完了,吃不了大馆子,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、饵块。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,有焖鸡(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,不是鸡)、爨肉(即肉末,音川,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)、鳝鱼、叶子(油炸肉皮煮软,有的地方叫“响皮”,有的地方叫“假鱼肚”)。米线上桌,都加很多辣椒,——“要解馋,辣加咸”。如果不吃辣,进门就得跟堂倌说:“免红!”

到连吃米线、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,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“伙食”。饭是“八宝饭”,通红的糙米,里面有砂子、木屑、老鼠屎。菜,偶尔有一碗回锅肉、炒猪血(云南谓之“旺子”),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,还有一种叫“魔芋豆腐”的紫灰色的,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。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:饭后不可张嘴——恐怕飞出只鸟来!

1944年,我在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了两个学期。这个中学是联大同学办的,没有固定经费,薪水很少,到后来连一点极少的薪水也发不出来,校长(也是同学)只能设法弄一点米来,让教员能吃上饭。菜,对不起,想不出办法。学校周围有很多野菜,我们就吃野菜。校工老鲁是我们的技术指导。老鲁是山东人,原是个老兵,照他说,可吃的野菜简直太多了,但我们吃得最多的是野苋菜(比园种的家苋菜味浓)、灰菜(云南叫做灰藿菜,“藿”字见于《庄子》,是个很古的字),还有一种样子像一根鸡毛掸子的扫帚苗。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。

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上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，黑色，形状略似金龟子。老鲁说这叫豆壳虫，是可以吃的，好吃！他捉了一些，撕去硬翅，在锅里干爆了，撒了一点花椒盐，就起酒来。在他的示范下，我们也爆了一盘，闭着眼睛尝了尝，果然好吃。有点像盐爆虾，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，——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，别的树叶不吃。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。这玩意多得很，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。

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，可以写一大本，撮其大要写了一首打油诗。怕读者看不明白，加了一些注解，诗曰：

重升肆里陶杯绿^②，
饵块摊头炭火红^③。
正义路边养正气^④，
小西门外试撩青^⑤。
人间至味干巴菌^⑥，
世上饕人大学生。
尚有灰藿堪漫吃^⑦，
更循柏叶捉昆虫。

一半光阴付苦茶

昆明的大学生(男生)不坐茶馆的大概没有。不可一日无此君，有人一天不喝茶就难受。有人一天喝到晚，可称为“茶仙”。茶仙大抵有两派。一派是固定茶座。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，每天在一家茶馆里喝三遍茶，早，午，晚。他的牙刷、毛巾、洗脸盆就放这家茶馆里，一起来就上茶馆。另一派是流动茶客。有一姓朱的，也是研究生，他爱到处遛，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，坐下喝一气茶。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。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，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，喝足了茶可以小便，不至被尿憋死。

关于喝茶，我已经写过一篇《泡茶馆》，已经发表过，写得相当详

细,不再重复,有诗为证:

水厄囊空亦可赊^⑧,

枯肠三碗啜葵花^⑨。

昆明七载成何事?

一半光阴付苦茶。

水流云在

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,我们对云南、对昆明也很有感情。我们为云南做了一些什么事,留下一点什么?

有些联大师生为云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实事,比如地质系师生完成了《云南矿产普查报告》,生物系师生写出了《中国植物志·云南卷》的长编初稿。其他还有多少科研成果,我不大知道,我不是搞科研的。

比较明显的,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。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,连闻一多先生都在中学教过国文,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,是有很大作用的。

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,呼吸到独立思考,学术自由的空气,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,比较新鲜活泼。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,是抽象的,是一种气质,一种格调,难于确指,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。如云如水,水流云在。

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

注 释

- ① 本篇原载《中国作家》1994年第四期;初收《汪曾祺全集》第六卷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8年8月。
- ② 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。市酒是普通白酒,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,谓之“玫瑰重升”,似乎有点玫瑰香气。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绿陶的小碗里,一碗可盛二小两。
- ③ 饵块分两种,都是米面煮熟了的。一种状如小枕头,可做汤饵块、炒饵块。

一种是椭圆的饼,状如鞋底,在炭火上烤得发泡,一面用竹片涂了芝麻酱、花生酱、甜酱油、油辣子,对合而食之,谓之“烧饵块”。

- ④ 汽锅鸡以正义路牌楼旁一家最好。这家无字号,只有一块匾,上书大字:“培养正气”,昆明人想吃汽锅鸡,就说:“我们今天去培养一下正气。”
- ⑤ 小西门马家牛肉极好。牛肉是蒸或煮熟的,不卖炒菜,分部位,如“冷片”、“汤片”……有的名称很奇怪,如大筋(牛鞭)、“领肝”(牛肚)。最特别的是“撩青”(牛舌),牛的舌头可不是撩青草的么?但非懂行人会觉得这很费解。“撩青”很好吃。
- ⑥ 昆明菌子种类甚多,如“鸡枞”,这是菌中之王。但有一点我至今不明白它为什么只在白蚁窝上长“牛肝菌”(色如牛肝,生时熟后都像牛肝,有小毒,不可多吃,且须加大量的蒜,否则会昏倒。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,竟至休克)。“青头菌”,菌盖青绿,菌丝白色,味较清雅。味道最为隽永深长,不可名状的是干巴菌。这东西中吃不中看,颜色紫褐,不成模样,简直像一堆牛屎,里面又夹杂了一些松毛、杂草。可是收拾干净了,撕成蟹腿状的小片,加青辣椒同炒,一箸入口,酒兴顿涨,饭量猛开。这真是人间至味!
- ⑦ “藿”字云南读平声。
- ⑧ 我们和风鸢街几家茶馆很熟,不但喝茶,吃芙蓉糕可以欠账,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钱去看电影。
- ⑨ 茶馆常有女孩子来卖炒葵花子,绕桌轻唤:“瓜子瓜,瓜子瓜。”

小滂河的水是会再清的(代序)^①

我和陶阳是50年代认识的。那时他还很年轻,才从大学毕业。我们都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。陶阳在大学时就写诗。我看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诗,看过他尚未写定的诗稿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他是喝小滂河的清水长大的。我一直还记得他的一句诗:

家乡的高粱杀了吗?

(我们曾经讨论过“杀”字应该怎么写。)

后来我离开了民间文艺研究会,和陶阳只有一两次稿件上的往来,很少再联系。他后来从事神话和民间文学历史的研究,出版几本很有分量的专著。我未见他发诗,我以为他已经“洗手不干”,放弃写诗了。

不料他给我送来新编的一卷诗,让我写一个序。

陶阳曾在日本住了4个月。这个集子都是在日本写的,或写日本的。集名《扶桑风情》,我认为是合适的。“扶桑”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,而且寄托了一个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,从历史到现代的源远流长的感情。

4个月不算短,也不算长,能够写出多少东西?我有过这样的经验:到一个地方住了几天,想写一点感受印象,结果是觉得很一般化,抓不到什么东西,甚至觉得不值一写,于是废然而止。用散文写游记,有点像“冬瓜撞木钟”——不响。

陶阳另辟蹊径,写诗的他用诗人的角度,诗人的眼睛,诗人的感情看日本。于是便和一般的用散文写的记游叙事的流水账不同。

两道黑黑的眉毛,
一双水汪汪的眼睛,